

HUISHOU WUSI

回首

五四



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

董德福 史云波 著

百年风云激荡 五四历史回眸

五四运动是个说不完的话题，它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既深且广；五四运动也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任何解说似乎都难以概括它的全貌；五四运动更是一个十分敏感、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它与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民出版社

江苏大学人文社科专著基金资助出版

董德福 史云波 著

回首五四

HUI SHOU WU SI

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董德福 史云波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01-007599-0

I. 回… II. ①董…②史… III. ①五四运动(1919)-研究 ②五四运动(1919)-人物研究 IV. K261.107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9689 号

回 首 五 四

HUI SHOU WU SI

——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

董德福 史云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80 千字

ISBN 978-7-01-007599-0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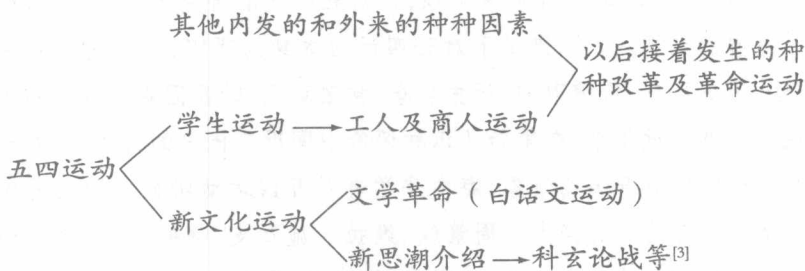
百年中国,风云激荡。社会大变革,引起思想文化大发展。各路英才登台呐喊,各种思潮竞相表演,各类运动此起彼伏。在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史上,无论是作为思想文化运动,还是作为社会政治运动,五四运动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五四运动是个说不完的话题,它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既深且广;五四运动也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任何解说似乎都难以概括它的全貌;五四运动更是一个十分敏感、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它与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中国现代史乃至当代史,五四是一个绕不开的入口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五四遗产的研究呈现出多面向性: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既有思潮研究,也有人物研究;既有纯文本研究,也有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赞成讴歌者有之,平心论评者有之,恶语相加者也有之。论者自认为看清了五四的真面目,实则看到的难免是水中月、雾中花。真实的五四需要在不断的研究中得到呈现。

90年来,五四运动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五四运动研究之研究,却未能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人们满足于对五四运动本身的研究,而对这些研究的视角、方法、历史认知、价值取向、历史哲学、党派意识、时代因素等方面却不太在意或挖掘不够。近年来,在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对五四运动研究之研究似有升温的迹象,海内外学者对五四运动研究史的反思成为当代五四运动研究的一大亮点。周策纵、维拉·施瓦支、林毓生、张灏、余英时、沟口雄三、殷海光、欧阳哲生、欧阳军喜、罗志田、董德福、洪晓楠、张宝明、汪乾明等海内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1]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着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此后身份角色的转变以及时代风云的变化,不同的政治集团、学术派系,不同身份的当事人,以及不同时代的解释者,对五四运动作出了符合本集团利益及各具时代特征的多元化的诠释和历史评价:或有意张扬其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的方面,或突出强调以爱国主义和民族

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方面。总而言之,五四研究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五四,共产党有共产党的五四;自由主义者凸显五四的思想启蒙主题,保守主义者出于对五四破坏性的忧虑,执意护卫传统,以此展开对现代性的质疑;亲自参与五四运动的人事后对五四运动的回忆,又不同于“后五四”时代的人对五四运动的诠释。不仅如此,五四研究也呈现出时代性差异,打上了不同时代精神取向的烙印。可以说,同一个五四运动,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党派和学派,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和意义。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确因解释者观察立场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与五四遗产本身的复杂性也有极大的关系。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使用五四、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五四学生运动、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五四启蒙运动、五四文艺复兴运动等名词时,并没有对它们的所指作出明确的区分,或许压根儿就难以作出区分。美国学者周策纵在他那本享誉海内外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对五四运动作出了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2]其时间跨度为1917—1921年。这一定义是把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不再对其复杂面相进行细分。有类于此,自称是“五四之子”的台湾学者殷海光,将五四运动的内涵及其影响以图表的形式进行了勾勒,让人一目了然:



从广义上说,五四运动实包括爱国救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前期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爱国救亡运动又促使新文化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本是不可分开的两个方面。因此之故,本书若非特别说明,五四或“五四运动”所指均取广义。

研究五四,必然涉及对五四思潮的研究。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

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时期,伴随着近代以降国门洞开后的西学东渐,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在所难免。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困惑,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相互激荡的局面,三者彼此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与现实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共同描绘了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壮阔画卷。由于长期以来受中国革命洪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对激进主义的研究比较充分,相应地评价也较高,而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研究和评价则要滞后许多,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尤其是对保守主义思潮的研究,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例如: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将保守主义与五四新思潮完全对立起来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五四新思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又在怎样的意义上对五四新思潮的激进化态势起到了制衡作用?现代新儒家与学衡派作为五四保守主义思潮的重镇,它们思想中的现代性质素有哪些?其反现代性的特质有何价值?晚年梁启超能否划入保守主义阵营,其保守主义思想与一般保守主义有何区别?近期出现的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五四保守主义有何区别与联系?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对保守主义的研究远不能说臻于成熟。以学衡派领军人物吴宓为例,吴宓痛恨五四新思潮提倡者的言论,常常是恶语相加,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式的五四批判。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做法,但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引进西学,而是主张新文化建设要探本求源、融会古今中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吴宓视作顽固、守旧的反动文人,他的学养足以使他具有了与新派人物对话的可能,可惜的是对话没有成为现实,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我们认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表明其文化观念已经比较成熟,对追求现代性不是简单地表示赞同或反对,而是放眼全球进行辩证的思考,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追求现代性,这是研究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思潮研究离不开人物研究,后者是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进路。恩格斯曾称誉文艺复兴是呼唤巨人并产生了一批巨人的时代,同样,五四时期的中国也是呼唤巨人并产生了一批巨人的时代。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些五四思想界的巨人不仅光耀20世纪,而且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沐浴在他们的智慧之中。每当我们看到北京大学的校训——“爱国、民主、科学、进步”时,我们便很自然地想起这些思想巨人。

在众多五四人物中,胡适无疑是一位极具个性魅力且充满复杂性的问题人物,也是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绕不开的人物。著名胡适研究专家

耿云志先生曾希望学界开展“胡适与某某”的研究。近年来,许多青年才俊以“胡适与某某”为题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已经发表数十篇高质量的论文;同时,以胡适与毛泽东、胡适与梁漱溟、胡适与梁启超、胡适与鲁迅、胡适与蔡元培等为题的专著也已出版多部。我们认为,开展胡适与“新青年”同仁、胡适与长辈学者、胡适与友人、胡适与论敌、胡适与来华外国学人、胡适与学生朋友等方面的研究是极具价值的,既有利于胡适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我们认清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思潮。鉴于此,我们选择了陈独秀、钱玄同、罗素、泰戈尔、李大钊、梁漱溟等几位代表性人物,从特殊的角度研究胡适与他们的复杂关系。

五四遗产注定要被不同时代、具有不同政治价值取向和不同学术倾向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谈论着,五四人物也注定要被后人不断地提及。问题在于,怎样的五四研究才是正当而又有价值的?中国历史学家有“史德、史识、史才”之说。所谓史德,即史家之“心术”,指的是忠于历史,能在任何状况下“秉笔直书”,讲的是史家的为人;而史识指的是对历史判断方面的真知灼见,讲的是治史者的历史眼光和哲学睿智;史才则是掌握、剪裁史料以及叙事、表达能力,讲的是治史的方法和能力。遗憾的是史家中“三长”兼具者极为少见。研究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如何忠实于史实,紧密结合现时代的实际需要,总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经验教训,以精密的方法最大限度地从历史遗产中挖掘有价值的资源为我所用,不失为史家所追求的境界。五四以来的思潮与人物研究,将努力秉承上述治史原则,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注释:

[1] 海内外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反思性成果主要有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重寻胡适历程》(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沟口雄三:《另一个五四》(《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被解释的传统——五四话语在现代中国》(载《新文

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欧阳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罗志田：《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载《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董德福：《80 年来中共领导人的五四观回放》、《五四认知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分别载于《江苏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2002 年第 3 期，2005 年第 6 期）；洪晓楠：《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与话语重构》（载《文化哲学思潮简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张宝明：《自由神话的终结——20 世纪启蒙阙失探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汪乾明：《论二十至四十年代初五四的认同与变异》（《史林》1999 年第 2 期）；等等。

[2]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7 页。

[3]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5 页。

目录

contents

自序	1
----------	---

第一章 五四运动的误读与重构	1
----------------------	---

误读是难免的,重构也是必需的。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激进反传统运动,自然遭到有传统情结的人的诅咒和非议;五四运动作为提倡新思潮的运动,由于时间仓促,新文化的后进不满足于它;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爱国救亡运动,致力于思想文化启蒙和文艺复兴的人士不免要对它提出批评;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一些政治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2
- 二、五四是全盘性反传统吗/4
- 三、五四与“文革”关系甄别/6
- 四、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8
- 五、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与话语重构/13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话语的确立与演进	21
-----------------------------	----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和意义?五四运动有哪些成绩和缺陷?五四运动与近代以来历次民族运动有何异同?五四运动的中心内容和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共早期领导人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五四革命话语系统的?毛泽东对五四总司令陈独秀的评价为何前后竟然如此迥异?

- 一、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五四观/22
- 二、瞿秋白：五四认知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30
- 三、毛泽东：对五四的官方解读/39
- 四、毛泽东与陈独秀：五四青年对五四总司令的评价/49

第三章 保守主义视野中的五四运动 63

五四是一个多面相的复杂历史现象，以现代新儒家、学衡派和东方文化派为代表的保守知识分子，出于对五四破坏性的忧虑，愤起捍卫儒家传统，对西方文化提出质疑。保守主义者是如何通过批判五四、反思现代性来彰显自己的独特身份的？又是如何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追求现代性的？为什么说他们不是五四的对立面，而是五四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现代新儒家的五四观批判/64
- 二、哲学视阈中的学衡派五四观/75
- 三、梁启超：五四功臣话五四/86

第四章 国民党人五四观的多元性 105

五四运动究竟是由哪个政治集团领导的？这是学界和政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回答起来远比想象的要难得多。国民党反对新文化运动，但为了争夺五四的话语权，硬是夸大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力，这样的判断符合史实吗？朱执信堪称国民党参与和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人，为何他对五四既爱又恨？教育家蒋梦麟有着怎样的五四观？

- 一、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关系辨正/106
- 二、朱执信：革命党理论家对五四的早期评估/117
-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蒋梦麟/127

第五章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古今中西的矛盾及其化解 139

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科学与道德、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等，这一对对范畴构成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讨论的主题。在百年中国史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不绝如缕。它们特立独行，谋求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中学与西学的贯通，以人文自觉反对科学主义的武断，以

“保守”的姿态化解古今中西的矛盾。保守主义者为后人留下了怎样的思想遗产?

- 一、儒学的历史承续及未来发展/140
-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诉求/147
- 三、百年文化保守主义论衡/153
- 四、五四时期古今中西之争回眸/164
- 五、陈独秀与梁漱溟中西文化异同论/194
- 六、郭沫若五四时期“泛神论”思想的文化价值取向/203

第六章 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219

只要一提起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钱穆、贺麟等名字,人们很自然地以“保守”两字相许。他们并非反对科学与民主之新,只是坚持“返本开新”;他们亦非一味拒绝西方文化,而是擅长于借助西学,对传统儒学作出现代阐释。他们对五四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是否具有合理性?为什么现代新儒学思潮历九十年而不衰,至今仍有生命力?

- 一、新儒家“返本开新”论的实质/220
- 二、援生命哲学入儒的现代新儒学/229
- 三、梁漱溟生命化儒学的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238
- 四、梁漱溟“新孔学”研究 90 年/249
- 五、梁漱溟与冯友兰人生哲学之比较/265

第七章 胡适与友人 281

为什么说胡适是一位问题人物,也是研究五四绕不开的人物?保守的人说他太激进,激进的人又说他太保守;共产党批判他,国民党也不喜欢他;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是他的论敌,又是他的朋友;他对杜威崇拜有加,而对同样来自西方的大哲学家罗素却十分冷淡;他痛恨泰戈尔的言论,却自愿为他辩护。怎样才能揭开胡适这个“谜”?

- 一、“新青年”同仁:胡适与钱玄同/282
- 二、“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陈独秀与胡适/295
- 三、五四时期李大钊、胡适和梁漱溟之间的两度“合作”/304

四、巨人间的交往：胡适与罗素/311

五、胡适对访华泰戈尔的容忍与辩护/321

主要参考文献 337

后记 341

第一章

五四运动的误读与重构

新青年

LA JEUNESSE

民主 科学 进步 团结



第二卷 第三号

新青年编辑部

误读是难免的,重构也是必需的。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激进反传统运动,自然遭到有传统情结的人的诅咒和非议;五四运动作为提倡新思潮的运动,由于时间仓促,新文化的后进不满足于它;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爱国救亡运动,致力于思想文化启蒙和文艺复兴的人士不免要对它提出批评;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一些政治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30年来,五四运动研究几成显学。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渐成趋势。在此背景下,五四运动研究突破了原来的条条框框,五四话语权的垄断被打破,呈现出百家争鸣、海内外联动的生动局面,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穷,对深化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这些观点的提出者层次高,观点影响大,对今后的五四研究必将产生重要影响,特择其要综述如下。

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李泽厚在《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上著文,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认为现代中国在启蒙与救亡这两重同等紧迫的使命之间徘徊,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似乎永远得不到解脱。在李泽厚看来,启蒙与救亡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起初这两个主题是同步发展、相得益彰的,但一段时间后,民族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的平行局面,最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被救亡的“头号主旋律”所淹没、中断、压倒。“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1]李文涉及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思想革新与社会改造、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并作出了在当时极具个性化的回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是20世纪80年代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量级研究成果,很自然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持此论者大多认为,五四以后更为紧迫的政治救亡任务拦腰截断了启蒙的进程,使得五四思想启蒙半途而废。五四启蒙中断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主观原因,如新文化阵营内部左、中、右的分化,启蒙方向和重点的转移等,但更根本的是国际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迅疾变动,使得新文化运动的大批主力被迫投身到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从而大大削弱了思想启蒙的骨干力量。此后,现实的社会运动、政治浪潮、军事斗争此起彼伏,这就淹没了思想文化界刚刚掀起的微弱的启蒙努力。

历史地看,李泽厚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五四运动的主角之一胡适晚年曾不无惋惜地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让位于爱国救亡运动,实质是对五四思

想启蒙不幸的政治干扰。应该说,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与胡适的“政治干扰”论一脉相承,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五四观。

李泽厚的观点有支持者,自然也有反对者。反对论者认为,救亡与启蒙是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救亡有唤醒启蒙的一面,启蒙有促进救亡的一面,把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有失偏颇,断言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方面干扰、中断了启蒙的观点是错误的。张岱年指出:反帝是为了救亡,反封建是为了启蒙;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救亡必须启蒙,两个任务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新中国,是完成了救亡与启蒙的统一。所谓中国社会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的观点缺乏科学性和历史性。^[2] 龚育之说:“救亡与启蒙,反帝爱国与革新思想,两者交互为用,交相辉映,哪一个也没有压倒另一个,也不能和不应该压倒另一个。这一点‘便在当时已显然’:正是救亡运动给新文化启蒙运动开拓新的空间,赋予新的活力。”^[3]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近代以来,救亡已成为中华民族行进的主旋律,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4] 同样,沙健孙、龚书铎也认为:“救亡与启蒙并不是一个压倒一个的问题,而是相互促进的问题。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看,恰恰是救亡引起了启蒙。”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即五四前的启蒙运动阶段,此阶段的“新”指的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第二阶段虽然仍然包含着资产阶级新文化,但它已具有了更新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爱国救亡运动极大地把新文化运动推向前进,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5]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启蒙,是区别于五四前期倡导资产阶级民主、科学、个性自由的“另一种启蒙”,启蒙不能仅仅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为唯一标准。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更为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也赋予了新文化运动新的内容与特点,有学者将其称为“更高层次的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继续。^[6] 它标志着五四启蒙运动的阵营分化,对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新文化运动的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本身就表明五四启蒙运动的复杂性,将救亡完全置于启蒙的对立面,不利于揭示五四启蒙的这种复杂性。救亡压倒启蒙说实质遵循的是“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模式,以为只有彻底的思想启蒙以后才有可能出现中国的现代化,启蒙的中断不利于现代化的生长。这种看法是对五四

启蒙的特殊性了解不够,机械地拿西欧启蒙运动的模式来套中国的启蒙运动所致。

二、五四是全盘性反传统吗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已不计其数,也有许多不同观点的争论,焦点之一是新文化运动是否是彻底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将直接关系到对五四运动的评价问题,也关系到我们今天如何继承并超越五四的问题。五四“全盘性反传统”的观点最早出现于海外华人学界。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在其《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指出,五四时代的“显著特色就是在文化方面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一般而言,各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均有可能出现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传统是普遍的现象,但很少出现像中国五四时期那样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据林毓生的看法,反传统的思想产生于第一代知识分子,但其性质到五四却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因为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反传统思想只是针对某些特定事物或特定层面的反对,虽然态度激烈,但尚未至整体性反抗的程度,而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之所以对传统有整体性的反抗,实因他们未能从中国传统“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之有机式的一元论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的缘故。^[7]五四这种极端的反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很特殊的现象。因为正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在本质上,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涉及以下两种预设:第一,必须把过去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视为一个整体;第二,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予以否定。”^[8]美国学者张灏进一步强化了史华慈的观点,指出:

从五四开始,知识分子一方面把西方近代文明简化为科学和民主两大要素,另一方面把传统视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而与西方近代文明对立起来。所谓对立就是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有矛盾和抵触,而不可能汇通融合。对他们而言,西方近代文明代表进步,中国传统代表落后;西方近代文明代表光明,中国传统代表黑暗;西方近代文明代表开明的理性,中国传统代表非理性的情绪、冲动和偏执。按照这种简单二分法的逻辑,如果中国要进步,要理性,要前途光明,只有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要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则必须毫无保留地扬弃传统文化。他们认为: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灰烬上,才能重建中国文化。^[9]

林毓生的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观点传入国内后,被一些学者引为同调。甘阳认为,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把“现代化”与“西化”不恰当地等同起来,以一种全盘否定的“反传统”态度来对待中国文化,因此在客观上切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造成了所谓文化传统的“断裂带”。^[1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五四虽未直接宣称全盘反传统,但实际上已有全盘反传统的倾向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把过去一切典章文物及其价值都否认了,采取了“将婴儿与浴汤一起倒出去”的做法。胡国亨完全同意林毓生关于五四知识分子思想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观点,认为五四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反传统“完全继承了中国儒家那种历史意识及道德承担的精神”,并认为五四全盘反传统摧毁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五四运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态度,彻底地摧毁了我们文化的凝聚力,我们便会面对逐步分离解体的危险。有朝一日中国若遭此大难,‘五四’实难辞其咎”。并进而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五四’功不补过,应是不争的事实”。^[11]

与林毓生等人的观点不同,大多数学者并不否认五四新青年们曾经猛烈地抨击、批判封建文化,但不能简单地对此作“彻底决裂”、“全盘反传统”等结论。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合体,不能把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简单等同。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吃人的礼教”,并没有对包容百家的传统文化作整体的否定。王元化、李良玉与林毓生之间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彻底反传统问题展开的争辩,对我们认清这一问题是有帮助的。^[12]从五四先驱反传统所针对的和要解决的问题来看,焦点在孔教。其反传统内容包括:阐明孔子之道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不能定孔教为国教;揭示维护专制制度的孔教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反对将孔教写入宪法;集中批判三纲五常,揭示封建孔教的罪恶。严家炎指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有三个不当:一是把儒家当做了传统文化的整体;二是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做了儒家学说的整体;三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本来就有非主流的成分存在。^[13]另一部分学者则进一步认为激进反传统的言论只是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才是主流。例如耿云志指出: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中,部分青年或知识界中个别分子,有过过当的言论或过当的行为,应当加以批评和纠正,那完全可以理解。但把整个运动归结为“全盘性反传统”、“全盘西化”,那是没有根据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开辟了道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找到了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途径,并在许多领域做了开创性工作。^[14]我们认为这是关于五四反传统的平实之论,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和讨